

运动中的战斗力

——盘点志愿军开展的群众性运动

■潘金桥 孙磊 王可杰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广大官兵的聪明才智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运动，极大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战斗积极性、创造性，有效保证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，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。

杀敌立功运动，激发战斗精神。战争刚一打响，志愿军政治部就号召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争取立大功、当英雄。1951年4月，为更好地适应战场环境，进一步推动立功运动广泛开展，志愿军政治部制定《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（草案）》，明确志愿军各部队立功标准和评功方法，规定志愿军的军功分为2种4等。同时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性，该条例还详细规定战时和平时立功与英雄模范称号的授予标准，如荣立三等功即以反坦克武器击毁敌坦克1辆者、驱逐机驾驶员击毁或重伤敌驱逐机1架或轰炸机2架者。此外，我军根据战役阶段和各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、战术手段等，提出“打落打伤敌机立功”“穿插立功”“孤胆作战立功”“坚守阵地立功”“狙击杀敌立功”等口号。立功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，催生出一批批舍生忘死的英雄模范，创造出一个个感人肺腑的英雄壮举。据统计，志愿军涌现出杨根思、黄继光、邱少云等30余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。朝鲜政府也先后5次授予志愿军指战员勋章、奖章。

冷枪冷炮运动，积小胜为大胜。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，鉴于敌我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，日常战斗活动规模较小。为大量杀伤、消耗敌人，志愿军开展了冷枪冷炮运动，要求把神枪手、神炮手组织起来，采取“零敲牛皮糖”的战术，以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原则多打小规模歼灭战。1952年初，驻金化地区的第26军第230团组织全团特等射手，率先开展冷枪运动。该团特等射手使用多种轻武器开展“打活靶”竞赛，以29发子弹毙伤敌14人，使当面之敌数天内不敢在阵地上露面。1月29日，志愿军总部向全体一线部队推广第230团的经验。志愿军的冷枪冷炮运动由此拉开序幕，并逐步演变为群众性狙击活



中朝军民一起修复大同江桥。

动。在这场运动中，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神枪手、神炮手。张桃芳32天内用436发子弹毙敌214名，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；唐章洪65天“单炮游动”作战40余次，用弹73发，超越“三百方针”指标（即一百天内用一百发炮弹消灭一百个敌人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52年5月至1953年7月，志愿军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共毙伤敌5.2万余人，巩固了我军前沿阵地，挫伤了敌人锐气。

技术民主运动，提高作业效能。在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的“绞杀战”中，美军出动80%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运输线进行昼夜轰炸，妄图消灭我军作战力量。为粉碎美军“绞杀战”，解决运输问题，主要担负铁路抢修任务的铁道兵团发挥群众智慧，开展技术民主运动。其目的是争时间、省人力、省材料，具体实施分为两个步骤，一是推广算细账，通过算时间、算人力、算材料，进一步提高官兵责任心，使人人把脱线事故当成“敌人”；二是鼓励官

兵提出合理化建议，改进工具，促进增产节约，有力保证志愿军的作战补给。顺川大同江桥是我军支援东线、中线战场的交通咽喉，因此成为敌人日夜疯狂封锁的主要目标之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从1951年9月至1952年2月，敌军便对此处进行38次大规模轰炸。此外，季节性自然灾害，如春季桃花泛、夏季洪水等对桥梁也有很大威胁。在敌机和天灾的双重破坏下，志愿军铁道兵团第4师第4桥梁团1营开展技术民主运动，将技术人员与广大战士相结合、技术与劳动相结合，创造出40余种高效的工作方法，使工作效率提高6倍。该营在接受抢修大桥任务的近2个月时间里，连续连修、随修随修，确保了大桥炸不断、打不烂、冲不垮，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。

防疫卫生运动，抵御敌细菌战。1952年年初，美军为挽回战场上的败局，增加在停战谈判中的筹码，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发动细菌战。1952年3月1日，为抵御敌军细菌战，志

愿军成立总防疫委员会，颁布简明易行的个人与集体卫生防疫守则，并通令全军执行。志愿军各部队迅速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，一启动手灭鼠，消灭媒介昆虫，开展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。防疫期间，战士们创造性地发明出木匣捕鼠器、灭鼠蒸汽机、自动开关垃圾箱等工具。同时，志愿军还协助朝鲜军民开展防疫卫生运动。由于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及时高效的防疫措施，疫情很快得到控制。至1952年冬，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近一年的斗争，终于彻底粉碎敌人的细菌战，进一步加深了中朝人民友谊，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。

“三爱”运动，强化保障责任。在敌人对我后方疯狂轰炸、封锁和破坏的情况下，及时抢救、治疗和转运伤病员，保护和输送各种作战物资，成为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的中心一环。为战胜重重困难，完成后勤保障任务，后勤部队广泛开展爱伤员、爱车辆、爱物资的“三爱”运动，以提高官兵政治责任感，使我军伤病员治愈率由入朝作战初期的91%提高到近94%，车辆损失率由初期的42.8%下降到不足2%，物资损失由初期的13.4%下降到0.8%，有力推动各项后勤保障任务的完成。同时，“三爱”运动和立功运动密切结合，汽车部队开展了以反轰炸、爱车辆为中心的安全行车运动；仓库开展了以保管物资为主要任务的防空、防特、防火、防潮、防霉烂变质“五防”以及保质、保量、保安全“三保”立功运动；医院开展了对伤病员的治疗好、安全好、后送好、生活好、精神好“五好”立功运动；防空哨部队开展了“千哨百日无事故”立功运动。

除以上群众性运动外，志愿军还广泛开展了施工民主运动、想办法运动、互教互学运动、创造模范支部运动等，将政治工作深入实践中，充分依靠群众，坚决相信官兵运用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能够战胜任何困难，这是长期斗争和建设中的宝贵经验。

史说新语

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

桂陵之战是战国时期发生在齐魏两国间的一次著名战役。公元前354年，魏国出兵攻打赵国。次年，齐国以田忌为主将，孙臆为军师，出兵援救赵国。齐军通过进攻魏国都城大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迫使魏军回援，并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（今河南省长垣市西，一说山东省菏泽市东北）设伏，击溃魏军。孙臆在此战中避实击虚、攻其必救，创造了“围魏救赵”战法，成为后世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。

桂陵之战

■于涌泉

决计出兵

魏惠王时期，为争霸中原，实现魏国在黄河流域的扩张，魏国将都城从安邑迁至黄河以南、被诸多水系包围的平原——大梁。这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戒备。赵国开始与齐、燕等国交好以制衡魏国。魏惠王察觉有被其他诸侯国联合进攻的可能，决定找机会突破以解除危机。公元前354年，赵国进攻依附于魏国的卫国。魏国立刻以庞涓为将出兵攻打赵国，很快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（今河北省邯郸市）。

魏国兵临城下，赵国派使者向齐国求救。齐国内部对是否发兵救援展开激烈争论。邹忌反对出兵，而段干朋认为不救赵“不义且不利”。齐威王追问原因。段干朋指出，若不救赵，魏国一旦吞并赵国，将会对齐国构成更大威胁。因此，段干朋建议齐威王兵分两路攻打魏国的襄陵（今河南省睢县附近）来疲弱魏军，然后另一路趁魏军攻破邯郸后救援赵国，这样既能救赵，又可削弱魏、赵两国实力。齐威王随即采纳了段干朋的建议，以田忌为主将，孙臆为军师，统率一路兵马救援赵国。

围魏救赵

齐国出兵后，齐将田忌欲率军直接与魏军主力决战，被孙臆阻止。孙臆说：“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击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”齐军此时发兵邯郸，则等于替赵受敌，况且与魏军直接交战，齐军胜算不大。解救赵国之围，就像劝止别人打架，劝架的人不必参与进去。解围的诀窍是，抓住敌人关键的地方，避实就虚，击其要害，这样就能控制住整个战局，激烈复杂的战争冲突自然解决了。魏国为拿下赵国都城邯郸，势必倾全国之力，出动所有精兵强将，留守国内的不过是些老弱病残。齐军若南下进攻魏国都城大梁，魏军必然回救大梁，从而解邯郸之围。田忌听从了孙臆这一计谋。

据《孙臆兵法》记载，孙臆并未直接进攻大梁，而是先佯攻魏国的平陵（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东北）。平陵地大城小，人口众多，兵力充足，很难攻克；而且平陵地处宋、卫两国之间，齐军运粮困难，佯攻此地能很好地迷惑魏军，使魏将庞涓误认为齐军主将指挥无能而产生骄敌心理。在孙臆嘱咐下，田忌故意在平陵输给魏军。孙臆通过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”以及“强而避之，卑而骄之”的做法，使魏军作出错误判断，从而为最终击败魏军做好准备。

齐、魏两军在平陵对峙后，孙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便让田忌一面派出轻装战车，直捣魏国都城大梁城郊，以激怒庞涓使其率军回援；另一方面，派出少数部队佯装与庞涓的部队交战，故作示弱使其轻敌。田忌按孙臆的计策一一部署。此时魏军刚刚攻破邯郸，尚未得喘息之机便被迫回援。庞涓丢掉辎重，以轻装急行军昼夜兼程回救大梁。当回援魏军到达桂陵时，遭遇齐军伏击。齐军以逸待劳，魏军猝不及防，遭遇惨败，庞涓也被齐军所擒。“围魏救赵”就此完美收官。

战术解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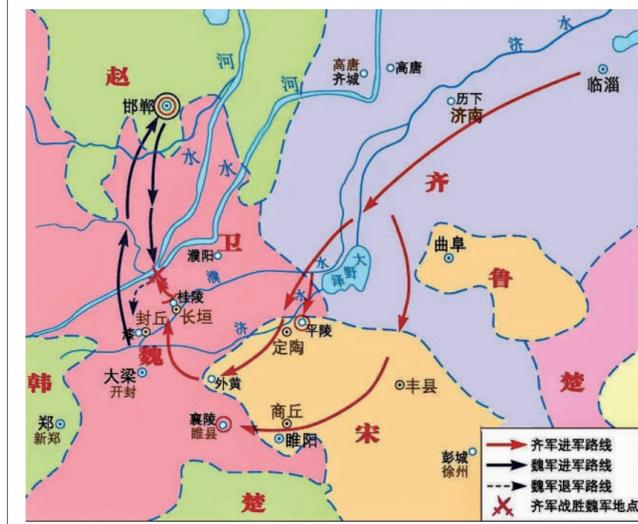
桂陵之战后，围魏救赵成为兵法中的重要策略。它体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“以迂为直”的思想，即抓住事物主要矛盾，通过表面舍近求远的方式达到目的。围魏救赵也被后世军事家列为“三十六计”中的重要计策，并被不断借鉴。唐德宗时期，吐蕃攻打盐州、麟州等地，威胁长安。德宗派唐军从四川进攻吐蕃，迫使吐蕃军队回援，减轻了唐西北边疆的压力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有效缓解了蒋介石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，对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重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孙臆在马陵之战中曾再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公元前341年，魏国进攻韩国，韩国向齐国求救。齐国在韩、魏两国血拼之后进攻魏国以围魏救韩，魏国撤回攻韩军队迎战齐军。孙臆利用魏军悍勇且轻视齐军的弱点，主动退却，并通过减灶之计制造出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。庞涓果然中计，于是丢下步兵，只率精锐日夜兼程追赶齐军。当庞涓行至马陵道（今河南省范县，此外还有山东省莘县、山东省郯城县等说法）时遭遇齐军伏击，庞涓战死，魏太子申被俘。经此一战，魏国实力明显削弱，一直被魏国压制的秦、楚等国则磨刀霍霍，战国群雄相争进入白热化阶段。

相关链接

《孙臆兵法》

《孙臆兵法》为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孙臆所著的军事著作（一说是孙臆弟子整理）。马陵之战后，孙臆辞官归隐，潜心著述，终成此书。孙臆继承发展了孙武、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，总结吸收了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，提出许多进步的政治、军事主张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如孙臆强调要遵循战争规律，发展生产以巩固战争的经济基础，作战时要善于创造对己有利的态势等。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竹简本的《孙臆兵法》，使这部失传已久的古代兵书得以重现天日。



桂陵之战示意图。

微历史

脑洞大开的拐弯枪

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英军在战壕望远镜的启发下，发明了战壕潜望镜步枪，由于效果不理想，很快就被遗忘。拐弯枪的设计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。德国为STG44突击步枪制造了一种弧形的替换枪管。受此启发的美军将M3冲锋枪也作了枪管“拐弯”设计尝试。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技术，拐弯枪的研发未能取得显著进步。

随着高新技术不断发展，现代意义上的拐弯枪面世。2003年，以色列工程师设计出拐弯枪射击武器系统。该系统由两部分组成，前半部分是枪管和彩色摄像头，后半部分是枪托。使用者可利用该系统中的高分辨率摄像机和液晶显示屏监视器，从有利位置观察目标，向敌方射击并将目标画面发送给队友或后方指挥所。该系统完成测试后，拐弯枪受到关注，并被多个国家的特种部队装备。

套上“呼啦圈”的飞机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、德、法、美等国先后为战机安装大体积、形似“呼啦圈”的圆环，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二战初期，英国舰船接连遭到德国磁性水雷重创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英国意外获得一枚磁性水雷，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反磁性水雷的航空扫雷具。他们把“威灵顿”轰炸机作为搭载航空扫雷具的扫雷飞机，在机体下方安装由轻质木材制成的中空圆环，圆环内装有铝芯线圈。使用时，圆环变成超大型的电磁线圈，通过飞机的低空快速掠过进而诱爆磁性水雷。航空扫雷极大提升了英军排除德军布设磁性水雷的效率。不过，该扫雷机在执行任务时需要保持超低空慢速飞行，很容易成为敌方战斗机的攻击目标。随着战后音响水雷、水压水雷等新型水雷登场，套上“呼啦圈”的飞机成为过去式。

（于洋 杨正硕）

汉口大和街26号

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诞生

■林业茂 郑大壮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，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（简称新四军），并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。为顺利推进新四军筹建工作及军部选址问题，叶挺于10月下旬前往延安，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情况。毛泽东亲切接见叶挺，向其讲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，同时对新四军的军部选址问题作出明确指示：“军部驻武汉，南昌、福州设办事处”。

延安之行结束后，叶挺于11月12日返回武汉，开始了新四军军部正式组建工作。由于经费紧张，叶挺倾向于将军部设在汉口日租界内，主要考虑抗战爆发后，日侨已悉数撤走，他们的房产已被查封。另外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设在汉口中街89号（今长春街57号），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就设在办事处内，新四军军部靠近这里，便于今后沟通协调工作。

选址期间，叶挺带领工作人员在汉口日租界内反复考察，一条街一条街地转，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比较。通过反复权衡，最终选定位于大和街26号（今汉口胜利街332-335号）的一幢二层住宅楼。这里距离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步行仅需几分钟。当时，这幢住宅楼处于无人居住状态，叶挺亲自带人开锁启封，随后悬挂“新四军筹备处”的牌子。

12月14日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，以加强南方游击区党的工作，项英任书记。12月23日，项英、赖传珠等一批被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达武汉，与叶挺、张云逸等共同商讨和部署新四军的组建工作。12月25日，叶挺、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新



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现状。

四军干部大会。会上，叶挺、项英分别报告了现阶段的形势任务、南京和上海沦陷的经过和原因，并部署了相关工作。这次会议，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。大和街26号挂出的“新四军筹备处”牌子正式替换成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”的牌子。

紧接着，叶挺、项英为尽快建立新四军的领导机构，接待、调配了大批从延安来的干部，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、科干部，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、干部任命、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。

1938年1月4日至6日，因战事需要，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。随着干部陆续到达，司令部、政治部和后勤机构逐步建立。1月28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刊登新四军军部启事：“本奉命即行整编出发，军部当即移驻南昌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日结束。以后驻汉

办事处事宜，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处长代办。所有一切公文、信件，请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。”至此，汉口军部驻地作为新四军第一个军部驻地的历史使命正式完成。

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后，汉口新四军军部改为新四军驻汉办事处，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兼任主任，负责国共双方的联系，请领和转运军需物资等工作。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，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成为居民住房。2006年4月，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按新四军军部旧址原貌修复，辟为纪念馆。同年12月，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。这段尘封了60余年的历史遗迹，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链接历史